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一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五期 ——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1b）

【当事人说】	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	阎阳生
【童年旧事】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个小镇的文革始末	野 夫
【往事追忆】	“北航黑会”和抓“5·16”运动	戴维堤
【难忘岁月】	康生印象——从仰慕到鄙视	梁守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当事人说】

清华附中红卫兵 1 0 0 天

• 阎阳生 •

〔《记忆》编者按：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

◇ 背景和伏笔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一、1966年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

典型事件：5。29圆明园成立红卫兵、6。3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6。8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 5月中：对校领导态度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57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57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 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派知道了红卫兵。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

“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二、1966年6月中——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

典型事件：6.8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6.24“造反精神万岁”、7.26江青接见、7.29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

◇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

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为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二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许多其他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不好的“右派学生”。

◇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年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16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三、1966年8月初——9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

典型事件：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8.18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联辩论和破四旧、红卫兵掌权、Y卧轨事件、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8.27《十点估计》、大串联

◇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在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泗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 8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8月6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齐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处于微弱的少数，只能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斗争据说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日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 8月8日：Y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17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是8月8日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静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6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 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40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27个人，留下了23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了。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安排人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但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整齐军装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旧衣破衫显得分外扎眼。

◇ 8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革命激情已殃及外国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影。

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我采访了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时年30岁）：是预651班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时年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呛，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年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有关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

◇ 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的“红八月”抵制暴力的作用。

◇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北京市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候觉得代表了红卫兵……”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

这时红卫兵的创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我把第四章省略并非对于红卫兵不重要，而是它已经没有了清华附中在历史上的独立性。“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争。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2008.5.29初稿，6.8缩写，7.17删节于华清

□ 原载《记忆》第十期

~~~~~

## 【童年旧事】

###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个小镇的文革始末

· 野 夫 ·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曾经对我善良的亲人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了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风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

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了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顶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章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七八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

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换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现实——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颂响——要打倒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党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 五 •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熄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分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 六 •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文革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悸——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四九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共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做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写于文革爆发40年

~~~~~

【往事追忆】

“北航黑会”和抓“5·16”运动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尽管“清队”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

军”、“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重大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汉发生“7·20”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为后话。

7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1968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冈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7月16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

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8·31”、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8·18”、贵州“4·11”、桂林“老多”、广西“4·22”、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全国2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冈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冈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师，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就是因为这个所谓“黑会”和会上的发言，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

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只不过“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7·28”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在此后不久的“7·28”大召见中，他老人家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

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是四川宜宾地书记。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刘、张二人平了反，回四川后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文革后被抓了起来。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28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报，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朋友，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到了自己的班级。

抓“5·16”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惨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

这就是北航的抓“5·16”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友们的“下场”！

~~~~~

## 【难忘岁月】

### 康生印象——从仰慕到鄙视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八章：“康生为我撑船”，标题为编者所加。）

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更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青年学生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央领导人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大的，思想水平都是高的。特别是康生，很早就听说，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中苏论战的大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写出的，心里更有几分特殊的敬意。

文革前，我见到最高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就是陈毅副总理。他的讲演让我热血沸腾，为祖国的富强，我愿肝脑涂地。对陈毅也只是远距离地听他讲演，说不上近距离的心灵对话。以后虽然与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由于处于观点对立状态，也说不上有什么平等的对话。文革初，他们对我们不平等。省委瘫痪后，我们对他们不平等。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间，以康生为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负责解决安徽问题。前面的几次接见，我因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听说前两次，主要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接见王中、李胜利、曹再凤态度很好。从汇报情况看，康生、王力、关锋对“一·二六”夺权还是基本肯定的。但当他们听到反夺权的不同意见后，对代表团成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经常是大声喝斥“G”派代表（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极了，所以叫“G”派），不准发言，认为“G”派代表的话都在欺骗他们。前几次接见，我不在现场，无法谈印象。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接见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也在。当“P”派个别代表（反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个屁，所以叫“P”派），在发言中有明显不实之词时，康生也不准“G”派代表澄清。例如，程明远发言中说“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省委是“和平让权”；“李葆华用三万块钱把梁守福收买了”等等。当李文安站起来要发言澄清事实时，康生拍着桌子不让李文安讲话，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声呵斥李文安：“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要听你的发言！不接受你的检讨！”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这样大声叫喊的就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无产阶级大理论家，无产阶级大革命家。当时我不敢将他大吼时的形象与电影里的什么坏人形象作对比。再看关锋，他的烟瘾特别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只要“G”派代表一发言，他就紧锁眉头，瞪着两只眼睛看你，表现出一种完全不相信的神态。他人干瘦，两撮鼻毛露在鼻孔外面大约有一厘米长，被烟油粘在一起，象在鼻孔里插了两只竹签。康生只要一坐下，就将两只鞋子脱掉，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王力倒像个白面书生，话不多，但在接见会场以外，却不止一次说“一·二六”是假夺权。

也许印象在一个政治家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年轻学生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原有的“神圣”想象一下消失了；原有的崇敬可能一下变成潜意识中的鄙视。这种鄙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它就会慢慢地成长。从潜藏在心灵深处不自觉的意识，成长为显现的社会行为。我就是个典型。

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来自对《九条》的不满，对《九条》的不满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下面我把一九六八年写的“认罪书”中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 （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就是在“一·二六”夺权快要被否定的时候，这时，我就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记得大约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和张来信同志（八·二七合师院纵队长）在原来李凡夫的住处（李凡夫因被李葆华点名批判后，搬出原住处，其房一直空着）闲谈心。张问我：“你对这次谈判前途估计如何？”我说：“看来承认‘一·二六’夺权不可能了，弄不好是程明远、刘秀山上台。”张说：“他们上台，我们就准备成反革命，即使实行军管，我也不干了，军管也只是个缓兵之计。”我说：“军管我也不干了”。接着张来信就谈到全国夺权情况，他也提到山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问题；重大“八·一五”的问题，说他们现在很消极。张问：“你看这种思想不解决，十年、二十年，毛主席百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我说：“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等主席去世后，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将来一分配，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就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的定时炸弹。”

到北京后，（指三月的北京谈判），根据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看，认为“一·二六”夺权肯定要被否定，刘秀山、程明远上台的可能性很大。有一天，有胡昭复，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谈，胡昭复也谈到重大“八·一五”，他说，现在重大“八·一五”搞的男同学到酒馆喝

酒，女同学到茶馆喝茶。他一讲到这里，我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来前和张来信的谈话。于是我就感慨地说：“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不少定时炸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毛主席去世后，这些人会不会再起来干？那时社会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六七年的七月，我不只是把自己的困惑用语言来表达。而是发展到给陈伯达、江青写信表达这些困惑。我再把同一份“认罪书”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我在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个思想，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建议中央处理问题时，能从三十年以后看效果，特别是处理群众问题上，不能给运动留下后遗症。弄不好，将来社会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八月初，我出于对“七·二零”事件处理的极度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困惑也发展到了顶峰。我斗胆给毛主席、周恩来写信阐述我的看法。下面我把另一份“斗私、批修”检查里的有关文字摘抄于后：

“去年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你抛出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打下去，今年的一月革命风暴，又是你点起的，二月、三月形势大好。但从四月以后，全国的夺权就变得冷冷清清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武斗，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被打了下去。去年六、七月份是群众斗群众，其形式是文斗；今年的六、七月份，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其形式是武斗。与去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对照，我怀疑在你身边，还有未被挖出来的刘邓。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篡夺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背着你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在同一封信里，我对许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也提出了看法：

现在，把许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例如：江西省的“大无联”、湖北省的“百万雄师”、四川省的“产业军”。这都是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同情者、支持者，恐怕上亿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其实，在这封信里，既反映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极度不满，也是担心安徽省的“G”派组织，会被康生、王力、关锋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必然引起对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极度不满，我在“认罪书”里的第二大罪过就是反对中央的《九条》决定。现抄录于后：

## （二）疯狂地反对《九条》

1.《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产物，不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

2.支持兵团调查组收集《九条》的黑材料。当时兵团调查组，在收集《九条》下达后的生产情况；老保翻天的情况；牛鬼蛇神出笼的情况等。我是知道的，我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因为这样做，对我有用处，我想利用这些材料证明《九条》是不符合安徽实际情况的。以此来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改变原来的态度，承认《九条》是错误的。

3.错误地认为《九条》仅仅是一种策略，有意暴露敌人的。我在许多报告中，都这样说过：《九条》下达后，形势大好，许多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4.在许多场合下，恶毒攻击《九条》。

（1）去年六月，有同学对《九条》发牢骚。我说发牢骚有什么用？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权，只要我们将来有了权，权是在我们手里，管它《九条》、十条，那只是历史资料中的一页。

（2）去年七月七日，在一次全体战斗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我含沙射影地攻击《九条》说：“今天是七月七日，刘秀山开个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为他吹捧叫好的，（因为刘秀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被李葆华点名批判的）明天是七月八号了，是《十六条》下达十一个月。《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我们是靠《十六条》起家的，我们对《十六条》感情最深。最近一个时期，宣传《十六条》的少了。明天，我们开一个纪念《十六条》下达十一个月的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掀起一个宣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的新高潮。”

（3）去年七月十六日晚，在省军区小礼堂的会议上，我说：“通过《九条》下达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九条》不是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的，是不符合安徽实际的。所以《九条》下达后，生产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武斗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阶级阵线不是清晰了，而是更乱了。《九条》不仅影响了安徽，而且影响了全国，现在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牛鬼蛇神为什么这么猖狂？就是由于《九条》的先天不足引起的。《九条》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是听了左派的话，而是听了程明远等叛徒的话。所以，它不可能是支持左派的，而只能为牛鬼蛇神利用。你们军管会有什么权？军管会的权又被《九条》剥夺了。你们有一点权的话，也是我们给你们的。”接着我又说：“我要是钱锞，我就不干了，我不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主任。”

按照我当时的思想逻辑，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开始，引伸到对《九条》的抵触情绪，认为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于《九条》引起的。进而发展到对参与制定《九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不满。为首的自然康生。除了前面所说的印象外，我的确有不少攻击康生、王力、关锋的言论和行动。

我支持“专揪王力战斗队”炮打康生、王力和关锋。

1.大约六七年的七月份，工大的李家鹏等人想整康生的材料找到我，要我给他们提供第一次北京谈判时，康生等人是如何压制“G”派代表发言。我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份书面材料，而且要李家鹏去找李胜利和李文安核对一下。

2.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合工大的宋某、范某在东天桥下的马路上碰到我。他们说：“在合肥干不下去了，想到北京去看看”。我问他们到北京干什么？他们说，想到北京看看王力能不能搞。我答应他们可以去看看动向，能搞就搞，不能搞千万不要乱干。

3.六七年七月份，合工大“红联会”的几个成员找到我，说他们到北京找王力辩论，我也是同意的，并答应给他们一点钱。

我在背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要轰康生。

我同李文安闲谈时说过：“康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整了这么多人，我看不要等下次文化大革命就有人搞他。”

我不仅在闲时常说攻击康生的话，后来发展到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也把发言的矛头对着康生。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严光在省军区召集“八·二七”兵团和“工联会”的头头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严光主要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对我们做些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仅公开发泄对《九条》的不满，而且公开批评康生：“我看康生就是没有被挖出来的刘邓，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轰他。就是他弄个《九条》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的，反革命搞个造反组织，杀人也是革命的。就是《九条》下达后，全国各地都搞成两大派，反正搞武斗也是革命的，哪个不敢搞。”

我不仅在一些小型的会议上把讲话矛头对准康生，而且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也公开向康生挑战。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说：“我怀疑在毛主席身边还有没挖出来的定时炸弹。就是这些人背着毛主席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只要我们能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以上言论也是摘自“认罪书”）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第二次赴京谈判代表团已经到达北京。为了接受第一次谈判准备不充分的教训，“G”派代表准备了两麻袋辩论材料。就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又专程赶到北京。一方面是给代表团鼓劲；另一方面也到七机部招待所看看老干部，问计于他们。

到北京后，形势对“G”派不利，因为严光离开了军管会，受到中央的批评。安徽省军管会的工作由十二军负责，这说明军区支左有错误。另外，“P”派的情报人员，将我历次骂康生的话整理成材料，这份材料我在合肥也看到过。而且我讲话的录音在合肥也听到过，我总认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对错误的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应该抵制。我认为自己是搞阳谋，是在抵制错误领导，怕什么。所以在北京时，代表团希望我主动向康生认错，写个检查，在康生接见时送给他。由于我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就愤愤地说：“我有什么错误要检讨的？二十年以后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